

从断裂到弥合：时空视角下 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变迁与重塑

贾玉娇 范家绪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伴随社会转型, 中国城乡家庭及其功能发生深刻变化。在养老服务格局中, 市场与国家逻辑逐渐强势, 家庭养老保障继替出现危机。在论及家庭养老保障式微的原因时, 有从结构—功能角度展开研究的, 也有从空间—功能视角展开研究的, 但是仅仅作出家庭“分中有合”的粗略判断, 且未能阐释家际互助资源的流向, 以及辨析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不同方面减弱的差异性。为此, 将家庭功能的物质载体——时空要素引入其中, 运用时空—功能视角, 提出代际时空区隔、错位概念, 找到国家、市场与社会组织在家庭养老保障功能重构中的角色功能, 提出分化家庭的新型聚合之道。

关键词: 家庭养老; 社会保障; 养老保障;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9) 07-0214-08

“家”历史久远, 自汉代以降越发成熟, 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 是个体获得养育、教育、婚姻、就业、养老、医疗照护、殡葬等社会服务资源的第一重支持体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伴随“家”结构的变迁, “家”功能的实现形式几经改变。尤其自晚清以来, 西方文明涌入中国, 揭开了由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等相对逻辑交融主导的历史演进的大幕。伴此剧变, 中国家庭经受了三次冲击: 20 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1949—1976 年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近 30 年指向家庭责任的经济理性的入侵,^① 家庭保障功能日趋衰落。进入 21 世纪, 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衰落之间的对比越发鲜明, 家庭处于养老压力增加和服务供给能力下降的失衡状态。家庭分疏化、小型化、离散化趋势增强, 养老服务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外在于家庭的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主体纷纷确立, 市场力量引入, 私人养老机构发展迅速, 社区为老服务中心普遍建立, 居家养老逐渐取代家庭养老。在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找回国家”浪潮推动下, 国家责任边界有扩张至传统家庭界限内部之势。延续两千多年的家庭养老保障面临空前继替危机。

面对如此挑战, 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是否需要保留? 对其作出根本现实拷问的是, 随着医学、科技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生育已不再是婚姻的维系纽带, 两性关系脱离传统婚姻秩序, 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及其功能是否需要保留, 成为隐寓于诸多理论、政策之中的基本问题。由各国的相关政策来看, 形成了不同价值导向。西方国家以公民权利为基础, 个体化制度保障特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8ZDA119)。

作者简介: 贾玉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 范家绪,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专业方向: 养老保障。

^① 孟宪范 《家庭: 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3 期。

征鲜明。与西方国家不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显现出家庭保护的价值立场。在决定东亚各国深层结构的儒家文化中，“家庭”这块宝贵的治理资源是历经几千年的建构才确立起来的，国家不能放任自流让其走向衰落。在寻求离散化家庭的新型聚合之道时，需要明晰亘古至今的家庭养老保障的核心要义是什么，该如何重塑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关系，延存这一要义，并赋予时代内涵，亦即如何在养老保障与服务体系重构中建构新型的家庭养老保障继替机制，进而丰富家文化的时代意涵。

一、从“结构—功能”到“空间—功能”的视角转换

1. 结构—功能视角下的家庭保障功能分析

学者们多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对“家”展开分析，形成了一幅穿越时空的研究谱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具有多代、多家庭聚合的结构特点，早在《白虎通·宗族篇》中就有云“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① 张国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是由血缘、亲缘或姻缘关系且按照一定组织原理连接而成的社会单元。^② 此种聚合体具有三种显著功能：（1）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梁漱溟指出家族经济含三种财产顾恤之义：一曰共财之义，家族财产不可分；二曰通财之义，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无互通；三曰分财之义，由于伦理感情自然有亲疏等差，日常生活实以分居为方便，故财不能终共。^③（2）家是中国人的初级保障组织，同时也是给予个体保障的主要组织。卢作孚曾指出，人的衣食住都供给于家庭当中。你病了，家庭便是医院，家人便是看护。人是家庭培育大的，人老了，只有家庭养你，人死了，只有家庭替你办丧事，^④ 亦即“家”负有保障幼有所长、所学，壮有所娶、所劳，老有所养、所终的职责。此外，利用宗族、乡党间共有财产发展出了祭田、义庄、义学、社仓、义仓、学田等，以作为救济孤寡贫乏和补助教育之用。（3）“家”对成员负有教化职责。《白虎通》曰“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⑤ 家长负有以“法度”教育子女的职责，即把社会普遍而客观的伦理、规范、规则传递给年轻者，为其未来的社会实践养成合宜的习惯。

自20世纪以来，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和现代国家的重构中，中国的“家”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结构样态。宗族、家族的弊端被揭露、批判，单位这一新型的国家—社会连接组织取代传统家族，将个体纳入国家视域，传统家族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教育功能移交社会，家族内的聚合之道瓦解，具体表现为家庭小型化，核心家庭成为与个体利益关系最为紧密的初级组织。这一时期的“家”仅保留最基本的照护与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功能。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这一新兴社会群体形成，此后的中国家庭呈现出与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相伴生的结构特点。在初期，“三口之家”成为核心家庭的主要结构样态；伴随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涌动，以及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原生的三口之家呈现“空巢”结构状态；^⑥ 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独生子女成家立业后，与双方原生家庭形成典型的“四二一”家庭。^⑦ “四二一”家庭的提法描述的是具有紧密利益联系的直系组家庭^⑧ 内的代际结构。在论及家庭功能时存在以家庭分化

① 班固《白虎通》，载《丛书集成新编》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12页。

② 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第26页。

④ 卢作孚《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

⑤ 班固《白虎通》，载《丛书集成新编》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57页。

⑥ 曹信邦《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4期。

⑦ 宋健《“四二一”结构：形成及发展趋势》，《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

⑧ 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家户和家的“分”与“合”》，《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为前提的碎片化倾向,与“分而不离”的现实不符。为此,王跃生提出“家际”概念,将研究转向对亲缘关系成员多个独立生活单位互动状态的考察。

2. 时空—功能视角下的家庭保障功能分析

结构—功能视角下的分析展现出了一个家庭由大到小、由整合到分化,家庭功能逐渐被析出,以及离散化家庭之间功能整合的变迁过程,虽然揭示了家庭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忽略了两个基本要素——时间和空间,未能揭示代间的时间张弛差异、分化家庭的空间离散度对于家庭保障功能的影响,亦即在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程度、照顾老年人意愿以及家庭结构等相同的前提下,不同的子代时间张弛度与家际空间距离使家庭保障功能发挥程度不同。时空既是家庭存在与功能发挥的物质载体,也是其实现的基本限制条件,二者相互依存,空间距离的大大压缩直至即时在场意味着时间的缩短与共时。

在家的空间研究方面,“家”的定义中往往隐含着空间这一基本要素,如学者们一般将“家”的空间特征表述为同居共爨。^①如果说“家”更侧重于表述由血缘、亲缘等纽带关系结合而成的聚合体,“居”则表述出这一聚合体的空间结构特征,二者密不可分,互为依托。许慎《说文解字》对家的解释是“家,居也。”《尔雅》言“户牖之间谓之扃,其内谓之家。”^②对家庭居住安排展开研究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家们的兴趣所在,认为空间居住方式反映出家庭生活的组织方式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方式。^③同时,在一定的社会分工秩序下,家庭保障功能的时间维度逐渐凸显出来。在现代社会,工作与家庭照顾都具有时间密集性特征,从而导致同居或近距离聚居的子代家庭成员养老服务功能缺位。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财富、机会、社会声望等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吸引人口走出原生家庭所在地。代际间独立生活空间需求的增强,以及在现代城市居住安排商品化逻辑的主导下,直系组家庭分化已经成为常态。在一定的家庭可及时的时空压缩技术的支持下,直系组家庭经济支出能力的不同,导致家际空间距离与社会服务替代率形成差异,进而对家际功能重塑产生影响。那么,家庭空间分化表象下是否隐含着家庭功能内聚的诉求呢?促使家庭分而不离的动力是什么?该如何认识直系组家庭的分化?究竟是时空断裂下的功能区隔还是时空断裂与功能聚合的矛盾体?在传统东亚“家”文化的背景下,学者们发现现实动机和资源约束对家际空间产生重要影响。按照现实动机可将分析对象分为持传统型代际居住意愿的家庭组和空间聚合意愿较弱的家庭组。对于前者而言,虽然父母在居住安排上表现出邻近居住这一经过现代调试后的传统居住偏好,但是由于受父母与子女双方经济资源的现实约束,^④实际家际空间与主观愿望存在差异,^⑤进而呈现出现代家际居住空间与传统文化规范相背离的局面。^⑥之于后者,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家庭服务,从而弱化家庭组空间聚合力。^⑦社会服务只能部分替代家庭互助功能,而不能取而代之。老年人从家庭成员处获得的情感满足、心理关怀、精神慰藉对其生命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家庭居住空间安排是影响老年人福利的重要因素,弥合断裂的家际空间仍旧成为家庭主要形塑方向。在论及家庭居住分化背景下的家际适宜距离

① 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第一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② 《尔雅·释宫》。

③ 小岛克久、王茜铃《日本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以长期护理制度为中心》,《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1期。

④ William L. Parish,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⑤ 陈皆明、陈奇《代际社会经济地位与同住安排——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韩华为、高琴《中国城市低保救助的主观福利效应——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3期。

⑥ John R. Logan, Fuqin Bian and Yanjie Bian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Social Forces*, Vol. 76, No. 3, 1998, pp. 851-882.

⑦ C. Y. Cyrus Chu, Yu Xie, Ruoh Rong Yu “Coresidence With Elderly Par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utheast China and Taiwa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73, No. 1, 2011, pp. 120-135.

时, 研究指出“一碗汤的距离”是最利于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居住距离。^①所谓“一碗汤的距离”是指子女从自己家中给老人住处送去一碗热汤, 汤送到还不会变凉, 用此来形容亲子间居住相对独立而又不失亲密的距离。

上述成果积极推动了家庭保障功能研究, 揭示了传统家庭空间分化下的家际功能内聚, 并将空间距离引入家际功能分析。但是, 上述研究均以一定的时空技术为既定前提, 在其提供的人的时空能力的框架下展开讨论, 缺乏时空分析的张力, 对既定时空能力障碍的反思与批判不足, 未能突破家庭时空的传统定义, 因而难以找到现代家际功能的弥合之道。在此方面, 空间社会学和时间地理学理论可以为重新认识家庭功能的时空维度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空间一直以来是社会学中的经典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 西方主流社会学理论开启了“空间转向”, 出现了以列斐伏尔、苏贾、赫格斯特兰德、吉登斯等学者为代表的空间分析家, 空间社会学研究范式开始形成。列斐伏尔认为社会与空间具有辩证统一性,^②苏贾持同样的立场, 并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是社会的物质构成”^③。在日常生活中, 时间性和空间性构成个体行动目标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④赫格斯特兰德提出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资源对个体形成“能力制约”, 并在与他人一同完成一项活动时对其中的个体形成“结合制约”。由此形成一面面的“时空墙”, 圈定形成一个棱状区域, 即一个人在一天之中所能支配的时空量, 决定了个体一天之中的实际行为筹划。对此, 吉登斯列举一位名叫简的未婚母亲的日常棱状区域。他指出人的交通能力, 以及社会提供的降低结合制约的能力, 即缩短不同时空交汇点转换的时间能力, 会对个体的日常棱状区域有显著影响。^⑤此外, 时间地理学家们如雅内勒、卡尔斯坦提出“时空交汇观”^⑥和“生态制约”^⑦等概念。

上述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的分析框架, 在指出既定时空条件下家际功能聚合的空间限制的同时, 也留出了充分的重塑时空条件的讨论空间, 有利于本文对家际互动的时空结构形塑开展实质性讨论, 形成养老保障中多元主体共同在场的解决思路。

二、家庭结构的时空断裂及养老保障功能的弱化

1. 家庭结构时空变迁的社会转型逻辑

社会转型成为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语境, 是事物发展的主导逻辑, 其内蕴含着事物发展的现当代挑战与发展机遇。因此, 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应当运用社会转型思维, 在坚持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内核的前提下顺应社会转型蕴含的基本趋势, 找到化解社会危机之道。这是与由社会转型产生的社会危机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具有更加积极的建构意义。

学者们往往用社会转型来表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体制、结构与形态所发生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革, 其实质是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⑧的过程中, 传统与现代融合成为社会发展的新主导逻辑,

① Feinian Chen, Susan E. Short, “Household Contex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29, No. 10, 2008, pp. 1379-1403.

②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2.

③ Edward Soja, “Regions in Context: Spatiality, Periodicity an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Regional Question,” *Society and Space*, Vol. 3, 1985, pp. 175-190.

④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李康、李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00页。

⑤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李康、李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01页。

⑥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李康、李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00页。

⑦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李康、李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02-203页。

⑧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童星、文军《三次社会转型及其中国的启示》, 《开放时代》2000年第8期; 宋林飞《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 第19页; 陆学艺、景天魁主编: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页。

重构新社会秩序的过程。在这场整体性的社会变迁中,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使得农业在产业格局中的比例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依序逐渐提升,大量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第三产业,一场巨大的社会时空重塑进程随之开启。人的居住空间由传统农村自然村落、家庭聚居向现代城市商品化住宅小区、家庭散居转变。此外,由于现代社会中工作与家庭的时间密集性特征越发突出,导致劳动者工作与家庭时间投放的矛盾加剧,严重影响了子代对老年父母的照顾。在家庭离散化、小型化与子代家庭成员时间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共同作用下,家庭养老保障面临严峻挑战。需要注意的是,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变化并非一个时点事件,而是一个伴随中国社会转型深化发展的过程事件。从初期传统与现代家庭居住模式共存下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减弱,到家庭离散化趋势渐强下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无所适从,再到新时空结构下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再造,可能会延续几十年的时间。^①

2. 家庭结构的时空断裂

现代工业与新兴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将大量人口从农村推向城市,从现代化资本贫瘠的地区推向资本集聚的地区。中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业从业人口占比从64.38%降至48.23%。伴随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口的居住地正在发生剧烈的空间位移。与此同时,由于受种种现实条件的制约,家庭并未随之转移。绝大多数劳动迁移人口均面临谋生与家庭维持的两难选择。空巢家庭、隔代家庭、流动家庭是现代家庭空间断裂下的家庭结构类型。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显示,单人家庭、空巢家庭数量增多,在50岁以上及有子女的调查对象中,子女或子女配偶均不在本户居住的空巢家庭占40.3%,约占被调查老年人总数的一半,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10%。同时,隔代家庭——青壮年外出工作后,遗留在老家的老人和孩子所共同组成的家庭——数量增多,隔代家庭成员多被称为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近些年在三人户的流动家庭中,夫妻携子女共同流动的比例提高,占比为84.7%,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的分离状况依然普遍。

际空间距离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成员之间的时空交汇轨迹,际距离近甚至世代同居下子代与父代共处对子代日常活动的时空棱状区的影响相对较小,使子代提供的老年人照顾与慰藉具有时空可行性,^②进而有助于提高老年福利,反之则会使子女日常活动棱状区发生重大偏离,降低家庭服务提供者的可得性。^③同时,在世代同居或近距离居住的情况下,子代家庭成员的时间张弛度与对老年人照顾的时间密集度也会对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实现产生影响,亦即子代家庭成员时间紧张会弱化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当老年人处于失能状态时则会加剧子代的时间窘迫感。因此,即便父代与子代同居或临近居住,也会因为子代受常规性活动限制而形成隐形的时空墙,无法实现家庭养老服务供给的共时在场。

3. 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弱化

现代社会将青年人的时空存在抽离于传统家庭保障模式,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受现代化时空重组的影响较小,导致年轻人与老年人虽然同处一个自然时空的维度之内,但是处于不同的社会时空维度之中,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时空错位。在此代际时空区隔的背景下,社会开始了家庭时空一功能弥合的自我寻求,已婚子女与父母之间“分中有合”,际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日常生活关系。这些已婚子女将父母居所视为第二生活单位。然而,此种家庭聚合是否提高了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呢?或者说家庭保障中的何种功能得到强化?家庭互助资源的转移方向如何?不难发现,在此类际聚合关系中,代际互助资源流动的主要路径为向下转移,即老年人支持子代家庭,如喂养、照顾隔代子女,照顾子

① 王跃生 《社会转型及其对中国当代家庭的影响》,《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② 谢桂华 《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社会》2009年第5期。

③ 杜娟、杜夏 《乡村迁移对移出地家庭养老影响的探讨》,《人口研究》2002年第3期。

代饮食起居，这是中国纵轴式家庭关系这一深层结构的当代体现；代际互助资源向上流动较弱。代际时间张弛度不对称，老年人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来照顾子代，而年轻人没有充裕的时间来照顾老年人。因此，不能仅以家庭聚合作为衡量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唯一指标，而是要在家际聚合的空间结构外壳下，考察代际时空交汇。

那么，在代际时空区隔下，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出现何种程度与维度上的减弱？从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上看，主要包括经济物质保障、生活照料和护理、心理疏导与精神慰藉三大方面。其中，经济物质保障受时空区隔的影响不显著，相反，子女外出打工有助于提高家庭经济收入，从而提高对老年人的经济保障能力；^①后面两方面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代际时空区隔的影响较大。学者们纷纷指出地理间隔、居住地空间断裂导致家庭照料和心理、精神慰藉功能大大减弱。^②这是因为，老年人照料的时空密集性特征强，给予代时空存在提出挑战；有效的心理疏导与精神慰藉需要双方处于共同熟悉、相互理解的沟通情境下，由于亲代与子代之间长期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思维方式、语言形式、情感需求存在差异，导致老年人心理与情感方面的需求难以从时空区隔中的子女处得到满足。由此导致产生“赡养脱离”和“情感疏离”问题，^③亦有学者将其称为“供养—照料—慰藉”三重脱离。^④在此背景下，部分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产生较为严重的焦虑、彷徨、无助等心理和精神问题，老年抑郁患者和自杀人数不断上升，成为老龄社会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4. 面对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弱化的两种态度

面对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弱化，学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化对传统家庭的冲击下，社会养老终将取代家庭养老的核心地位。从近现代以来的家庭功能变迁历程来看，的确呈现出社会与国家取代家庭功能、家庭功能逐步瓦解的演变路径。在此进程中，家庭得以重塑，家庭、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以重塑。在这场多元主体责任边界重塑的过程中，国家边界开始扩张，浸入到传统家庭边界之中，并呈现进一步扩张之势。伴随现代社会迁移，家庭养老得以存在的血缘关系基础瓦解，公民身份的强调，强化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联，家庭养老意识淡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家庭养老在新时期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该保障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发挥。郑功成指出，虽然当前家庭赡养的功能呈弱化趋势，但是在深厚的家庭文化影响之下，有意识地扶持家庭养老，可以使家庭赡养功能得以发挥。^⑤穆光宗和张团指出，在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进程中，家庭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单位，而只有力量凝聚不散的家庭才可能在高龄化的冲击下经受住考验。^⑥

在家庭保障功能面临重大危机时，是该放任现代化力量将其侵蚀，还是坚守住家庭这块阵地，让其充当保障的第一重屏障呢？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确实面临子代与父代时空交错的客观困难，但是这一困难并非不能克服，从东亚一些国家的做法来看，运用有效的制度手段是可以弥合断裂的家庭功能的。同时，更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困难视为取代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依据。因为部分由家庭提供的养老保障功能是无法被国家与社会替代的。此外，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式微会产生较高的社会治理成本，加重国家负担。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衰落不可不说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大社会危机，急需找到应对方案。

① 姚远 《中国家庭养老研究述评》，《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1期。

② 张友琴 《城市化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厦门市个案的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谢桂华 《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社会》2009年第5期；Eileen M. Crimmins, Dominique G. Ingegneri “Interaction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Past Trends, Present Determinants, Future Implications,” *Research on Aging*, Vol. 12, No. 1, 1990, pp. 3-35; Hugo, G.,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Indone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11, No. 1, 2002, pp. 13-46。

③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编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7年，前言。

④ 穆光宗 《当前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及应对》，《人民日报》2014年6月16日。

⑤ 郑功成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⑥ 黄润龙、陈绍军 《长寿的代价——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5-316页。

三、家庭结构的时空弥合及养老保障功能的重塑

虽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家庭保障功能遭到削弱,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家庭养老保障的文化意涵及其国家、社会治理功能。即便在普遍实行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的西方社会,仍旧将家庭作为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的主要来源。^①在中国,“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并显示出强大、有力的保障功能,并非自然而然,而是在长期的历史选择进程中,经历了几千年的建构而成,其内蕴含着厚重的国家治理文明与智慧。有日本学者曾将中国的家庭比作保护中国稳定延续发展的万里长城。同时,中国人有着深重的“家”的情结。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中国年轻一代的两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家庭变得不再稳定,生育意愿减弱,但是并不能据此说明新一代中国人“家”的观念淡了,而是在家庭解体的表象内蕴含着一种建构新型家庭关系的社会动力,即越来越重视个体生命与婚姻家庭关系体验,并在两性关系互动博弈中形成相互尊重与美好关系感知的和谐状态。但是,在这一家庭关系变动及功能退化的转型进程中,如果缺少必要的引导与扶持,则有可能导致家庭迷失与溃败。因此,需要借助制度的力量唤回中国人的“家”本能,重塑“家”的时空维度,维护“家”的功能。

由两性关系变化所产生的家庭建立危机另当别论,就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庭而言,家庭代际成员之间的时空错位和区隔导致家庭养老保障功能难以实现,重新弥合并非是要运用法制手段强制家庭回归传统,^②而是在现代家庭发展的不可逆的趋势中,将家庭作为一个时空单位,促使现代化因素融入其中,国家和社会的资源注入其中,实现家庭养老保障资源的时空穿越,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共时共处。在此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以实现家庭养老保障资源链接、整合与释放为根本出发点,以弥合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断裂为根本价值立场,调整与家庭养老保障资源竞争甚至排挤的政策方向。老年人为国家、社会与家庭作出了长期贡献,从国家、社会与家庭处得到回报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获得感、满足感与幸福感,为使老年人形成美好的生活体验,以老年人家庭为时空中心,通过以下制度手段,实现资源与代际时空的交汇。

调整代际时空轨迹,为代际时空交汇提供制度保障。鼓励世代就近居住,形成“亲密无间”的代际居住格局,消解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空间障碍。在子代与父代就近居住购买一套住房时,任何购房一方可享受提高贷款额度与降低贷款利率等优惠。该就近购买住房优惠政策可享受一次,当子代与父代住房发生整体迁移,且一套就近住房已售时,亦即就近购买住房条件还原为初始条件时,可继续享受购买优惠。在缩短代际空间距离,改善老年人福利可及性的空间前提下,设置探亲、侍亲假,抑或陪伴老年人的法定时间,将商品化劳动时间密集的青年人从中释放出来,并调整青年日常时间分配,将陪伴老年人列入日常活动筹划之中,为代际间的时空交汇创造条件。在侍亲假期间,活力老人及子女参加由老年人所在社区开展的亲子活动,由社区工作人员记录在册;对于失能老人,由子女进行精神慰藉,由老年人照护机构人员进行纪录,最终记入个人社会诚信考核体系之中,作为社会信用等级评定的基础考核指标。

以代际家庭为单位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家际经济支持力,减轻子代经济负担。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虽然增强了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但是并未减轻个体的经济负担。目前,我国代际家庭具有消耗性特征,即年轻夫妇劳动所得一部分用来维持家庭经济的再生产,另一部分用来维持家庭福利的一系列开支,使得一对夫妇的家庭生计负担超出了传统家庭。这就需要以代际家庭为单位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减轻子代经济负担。例如,新加坡就

① 穆光宗 《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年,第346-347页。

② 郭沧萍、杜鹏 《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第69-70页。

鼓励子女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提高父母养老保险待遇。

打造智慧养老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多重资源的整合。建立社区云平台，实现具有相应诚信、专业资质与服务能力的企业组织与老年人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为老年人提供家政、送货/药上门、预约出租车、急救车等服务；在家中安装紧急救助按钮，便于老人及时预报身体险情。同时，设置单元进出数据纪录与预警系统，纪录每户老年人出门频次，智能计算老人出行规律，当老人进出频次有变时自动预警，网格员进行情况排查。避免因突发性疾病发生时，老年人不能及时报警、延误最佳救治时间的问题。不鼓励在老年人家中安置摄像头，这不利于老年人隐私保护。通过手机实现子代家庭成员与父代家庭网络互联，当老年人家庭的天然气、水、电等发生异常时发出警报提示。同时，开发子女与父母互动软件，将互动积分记入个人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包括将老年人每天吃药时间记入定时提示系统，由子女手机自动发出短信提示；将与父母有关的重要节日和日子记入提示系统，由子女按时发出通话或语音短信；每天早晚向父母发出语音问候，让父母感到子女的爱无时无刻都存在；每天定时与父母进行视频通话，设置最低通话时长等。

夯实居家养老的外部支持力量，形成良性互动体系。发展专业化的医疗、康复、护理、心理疏导等为老服务组织，规范为老服务市场，制定行业服务标准，由社会第三方进行动态的资质与社会信用等级评定，其结果作为申报国家招标项目的重要考核指标，在基本养老服务资源供给方面，国家可进行不同程度的购买，由社会组织根据不同经济条件的老年人及子代家庭提供低偿或无偿的服务，替代传统家庭照顾功能；可整合养老服务机构力量，实现市场为老服务资源下沉社区。这一方面有助于节省建设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实现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良性互动。养老机构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和成型的服务流程，社区有场地、有服务需求，在政府的引导与扶持下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为老年人提供便利、专业、安全的服务。同时，居家成本高的失能老人可转入养老机构，并在前期的服务过程中彼此了解，建立信任，有助于后期在院养老关系和谐；完善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流行病、慢性病与常见病的防治与康复服务；设置社区老年服务网格员，负责掌握辖区内老年人基本情况。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问题越发突出，其中引发的思考极为深刻，需要审慎对待，既不能完全盲从现代化养老趋势，也不能无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基础秩序重构的规律。在现代化背景下，不同代际家庭成员的时空轨迹存在疏离、错位与区隔问题，即便同居或就近居住，仍旧难以实现家庭养老服务过程中的共时共处。同时，随着老年服务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部分家庭养老服务内容交由专业化社会组织能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此外，部分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时空限制小。因此，顺应社会转型规律，辨析家庭养老保障中的哪些内容需要世代时空交汇，对于可以超越时空的保障内容可以借助制度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对于可被纳入更细的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家庭养老服务，可以在互联网技术、社区组织建设、市场规范化发展，以及国家制度扶持和监管的综合作用下，实现转型升级与优化配置，有效实现社会服务资源进入家庭养老空间。对于需要世代共时共处才能实现的养老保障内容，运用制度的力量，鼓励世代家庭距离为“一碗汤”的距离，同时释放子代商品化的劳动时间，设置探亲或侍亲假。此外，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鼓励子女与父母交流，并将子女陪伴或与父母交流的时间纳入个体的社会评价体系。家庭是中国这一超大型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性组织，家庭养老是一块宝贵的保障资源，不可放任自流，需要进行新时代下的新建构，以维系家庭，维系家庭保障的基础功能。

责任编辑：王永平